

#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 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sup>\*</sup>

高和荣 周 宇

**【摘 要】**文章利用 2010~2019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高水平 and 较高水平省份在东部集聚,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由西部集聚到中部集聚。(2)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均等化程度增强,但区域差距依然明显。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及就业水平对本地基本型民生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人口密度对基本型民生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财政分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注重基本型民生发展的区域均衡,增强基本型民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通过加大基本型民生项目建设,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关键词】**基本型民生 区域差距 影响因素 空间面板模型

**【作 者】**高和荣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周 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 言

关注民生是国家治理的历史基础,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时代课题。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准确把握民生建设状况,客观评估民生建设水平,尤其要重点关注绝大多数人的民生保障问题。民生保障水平有高低之分,根据民生保障的对象、项目及水平差异,本文将其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和富裕型 4 种类型(高和荣,2020)。其中,基本型民生因其覆盖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口,与民众基本生活最为密切,在 4 种民生类型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承担着民众基本的生活保障责任,维系着社会常态运行与发展的客观要求(高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提高和保障改善民生水平研究”(编号:18JZ043)的阶段成果。

和荣,2021),是改善型乃至富裕型民生的前提,实现富裕型尤其是共同富裕型民生必须解决好基本型民生问题。那么,中国的基本型民生建设目前处于何种阶段?不同地区的基本型民生水平差距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规律?这样的差距是由哪些因素导致?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奔向共同富裕型民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对民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生内涵、评价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在民生内涵方面,一些学者指出,民生关乎民众的生计,凡是涉及生计问题的都可以称为民生,这属于广义的民生,强调民生的综合性与全面性。然而,更多的学者从民众的基本生活、发展机会和生存能力等方面理解民生,将民生定义为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及社会治理等方面(童星,2019),在狭义层面上理解民生(王青、王娜,2014)。实际上,民生是一个扬弃福利及福祉的范畴,它描述了民众的生活状态,在按照保障水平划分的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和富裕型4种类型中,基本型民生承担着基本生活保障责任,维系着社会常态运行与发展。

国外学者鲜有提及“民生”概念,他们更多地使用“福利”一词去分析个人的权力与资格,以及国家的责任与作为(Wilensky等,1958;Disney,2004;埃斯平-安德森,2010;蒂特马斯,2011;Hemerijck,2018)。与此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嵌入于国家治理中,无论是最初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还是现如今的“民生保障”范畴的提出与实践,均表明国家通过顶层设计努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近年来,学界逐渐采用指标体系测量民生水平,对民生保障进行量化研究。但由于对民生内涵的不同理解,构建的民生指标评价体系差异较大。李志强等(2012)从民生、社会、经济、环境4个维度选取32个具体指标;王青、王娜(2014)从就业、收入、消费、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安全和公共基础设施7个维度选取19个指标;张弥(2014)从文化与教育、就业与收入、健康与医疗、社会与保障、住房与交通5个维度选取49个指标。

在关于民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现有文献较少从定量角度直接讨论民生的影响因素。叶胥等(2018)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测度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研究发现民生满意度与获得感显著正相关,并且从个体角度发现年龄与收入能够同时影响民生获得感与满意度。陈明华等(2019)研究发现,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是城市间民生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高琳(2012)分别使用基础教育与医疗两种公共服务满意度指代民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研究发现人口规模对基础教育满意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对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增长则对基本教育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姜扬(2018)研究发现,腐败、财政分权与城镇化水平均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民生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力。陈世香、谢秋山(2014)从微观、宏观两个角度选取影响因素,其中宏观层面选取人均GDP、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地方财政支出及人均公共服务投入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满

意度的影响因素。俞佳立等(2020)发现,人口密度、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城镇化水平对居民健康有正向影响,而医保参保率则有负向影响。就整体而言,各地区基本型民生建设水平差异与财政分权制度有关。有学者发现它既可以成为“援助之手”促进民生事业发展,也可以演变为“攫取之手”漠视民生建设(谭之博等,2015)。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对民生问题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从方法看,已有研究以定性为主,缺少定量研究方法。二是从内容看,学者们对中国民生发展水平进行评价时,缺乏对民生进行细分,没有精准地剖析某种民生类型,揭示各种民生类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中所具有的属性与特征、功能和使命。新时代民生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民生指标评价体系应契合时代发展大势,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和创新。鉴于此,本文运用熵权法、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中国基本型民生水平的整体发展和地区间均衡状况,探讨影响基本型民生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部门的民生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 二、研究方法

### (一)熵权法

相对于主观赋权法,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通过冗余度大小确定客观权重,使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本文利用 2010~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中国 31 个省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使用极差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熵权法的测算步骤如下。

$$\text{各指标的信息熵: } E_j = -\frac{1}{\ln n} \sum_{i=1}^n p_{ij} \ln p_{ij} \quad (1)$$

$$\text{确定各指标权重: }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2)$$

$$\text{计算各评价体系综合得分: } U_i = \sum_{j=1}^m w_j p_{ij} \quad (3)$$

### (二) Dagum 基尼系数

相对于传统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Dagum 基尼系数克服了子样本间的交叉重叠问题,而且能将区域差距分解为区域内差距、区域间差距和超变密度。故本文使用 Dagum 基尼系数测算全国及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和超变密度。其计算公式(Dagum, 1997)为:

$$G = \sum_{j=1}^k \sum_{h=1}^k \sum_{i=1}^{n_j} \sum_{r=1}^{n_h} |y_{ji} - y_{hr}| / (2n^2 \bar{y}) \quad (4)$$

$$G_w = \sum_{j=1}^k G_{jj} p_j s_j \quad (5)$$

$$G_b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D_{jh} \tag{6}$$

$$G_t = \sum_{j=2}^k \sum_{h=1}^{j-1} G_{jh} (p_j s_h + p_h s_j) (1 - D_{jh}) \tag{7}$$

其中,  $G_w$ 、 $G_b$  和  $G_t$  分别为组内、组间和超变密度差距贡献, 且  $G = G_w + G_b + G_t$ 。假定  $\bar{y}_h \leq \dots \leq \bar{y}_j \leq \dots \leq \bar{y}_k$ 。  $D_{jh}$  代表子群间  $j, h$  中,  $y_{ji} - y_{hr} > 0$  的差值加总的数学期望;  $p_j = n_j/n, s_j = n_j \bar{y}_j / n \bar{y}, p_h = n_h/n, s_h = n_h \bar{y}_h / n \bar{y}, p_{jh}$  为子群  $j, h$  中,  $y_{ji} - y_{hr} < 0$  全部子群对差值总和的数学期望。

(三) 空间面板回归模型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探讨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空间面板回归模型主要包含空间面板滞后、空间面板误差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3 种, 即:

空间面板滞后模型 (SPAR):

$$Y_{it} = \alpha + \rho W Y_{it}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tag{8}$$

空间面板误差模型 (SPEM):

$$Y_{it} = \alpha + \beta X_{it} + \varepsilon_{it}; \varepsilon_{it} = \lambda W \mu_{it} \tag{9}$$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SPDM):

$$Y_{it} = \alpha + \rho W Y_{it} + \beta X_{it} + W X_{it} \theta + \varepsilon_{it} \tag{10}$$

其中,  $Y_{it}$  为第  $i$  个省在  $t$  时期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通过 Queen 相邻构建;  $X_{it}$  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  $\alpha$  为截距项;  $\beta$  为回归系数向量, 表示不同因素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  $\rho, \lambda$  和  $\theta$  为相应的空间参数;  $\mu_{it}, \varepsilon_{it}$  为扰动项。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体系

基本型民生由基本的物质、服务和发展项目等部分组成。其中, 基本的物质项目 (如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等) 解决日常生活需求问题, 基本服务项目 (如基本的养老、医疗、休闲娱乐等服务) 解决生活服务需求问题, 基本的发展项目 (基本的教育、就业、职业技能培训等) 解决社会成员的生活能力提升问题 (高和荣, 2021), 它需要政府在其中承担主要的保障责任。鉴于此, 本文在充分了解中国民生发展的历史阶段、内在规律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国家统计局对民生指数 (DLI) 的论述<sup>①</sup>, 从 7 个维度选取 25 个指标, 构建一套反映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见表 1)。

① 中国统计学会、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2013 年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 (DLI) 统计监测结果》,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31\\_661933.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12/t20141231_661933.html))。

本文以中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数据来自 2011~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四、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

### (一)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及时空特征

1. 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

本文运用式(1)至式(3)测算全国及 31 个省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并绘制全国、三大区域<sup>①</sup>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趋势图(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2010~2019 年,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由 0.27 上升到 0.31,提高 14.8%。这说明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基本型民生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效,民众获得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截至 2020 年年底,中国 GDP 总量已超过 100 万亿元,为基本型民生改善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扩展民生建设的内容,将民生“五有”扩展为民生“七有”,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

表 1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综合指标体系

准则层	权重	指标方向
消费水平		
城乡居民八大类消费支出总和	0.041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013	-
社会保障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支出	0.060	+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均支出	0.068	+
人均城乡直接医疗救助	0.048	+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0.027	+
失业保险覆盖率	0.067	+
工伤保险覆盖率	0.064	+
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	0.039	+
提供床位的社会机构数	0.053	+
文化教育		
小学生师比(教师=1)	0.035	-
中学生师比(教师=1)	0.017	-
特殊教育生师比(教师=1)	0.017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0.023	+
就业与培训		
当期劳动争议案件结案数	0.069	+
本期登记求职人数	0.008	+
公共安全		
公共安全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重	0.027	+
交通事故发生数	0.011	-
公共医疗卫生		
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	0.038	+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	0.029	+
村卫生室数	0.059	+
医疗卫生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0.056	+
公共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拥有量	0.036	+
民众有线电视入户接入率	0.051	+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0.043	+

注:表中权重为熵权法计算的历年权重的平均值。

① 参照国家统计局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http://www.stats.gov.cn/zjtj/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http://www.stats.gov.cn/zjtj/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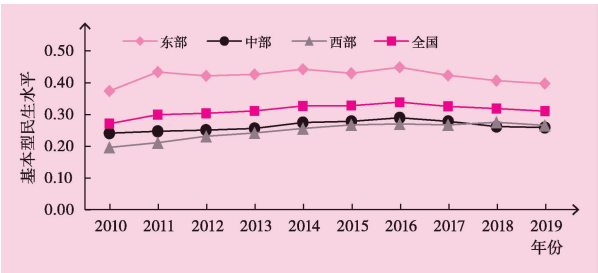


图1 2010~2019年全国及三大经济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

生保障体系。图1还显示,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并非逐年上升,而是具有一定的波动性。2010~2016年,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稳定上升。然而,在2016年达到高点后,基本型民生指数逐年下降。这是由于基本型民生覆盖范围广,政府每年的民生投入项目有所侧重,加上反映不同项目指标的权重不同,如果政府投入更大比例到权重占比大的项目,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可能会上升,反之有可能下降。因此,政府在进行民生项目投入时,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并及时对民生建设成效进行评估。

从三大区域看,东部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0.419)>中部(0.264)>西部(0.248),且东部波动幅度比中西部大,西部变动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西部地区整体呈上升趋势,并在2018年超过中部地区,这说明西部地区民生建设稳定,民生持续得到改善,但水平相对较低。

2. 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中间塌陷”的空间特征

由表2可知,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等级在空间上存在固化和变化并存的现象,且呈现出空间异质性特征。具体来看,等级固化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江苏、浙江、上海、

表2 2010~2019年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空间格局

水 平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9 年
高水平	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	北京	北京
较高水平	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	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广东	山东、江苏、浙江、广东	山东、江苏、浙江、广东
中等水平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福建、山西、四川、新疆、西藏	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陕西、重庆、四川、新疆	辽宁、天津、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	辽宁、天津、陕西、四川、西藏、新疆
较低水平	宁夏、湖南、江西、青海、海南、重庆	吉林、内蒙古、宁夏、河南、湖北、湖南、福建、海南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河南、重庆、湖南、福建、海南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青海、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福建、海南
低水平	甘肃、云南、贵州、广西	安徽、江西、云安、贵州、广西、甘肃、青海、西藏	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青海、西藏	宁夏、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广西

注:限于篇幅,仅列出每隔3年的结果。

广东(高水平),以及云南、贵州、广西(低水平)。2010~2019年,较高水平和高水平呈现东部积聚趋势,相邻地区具有正的空间集聚性。较低水平和低水平由西部集聚到西部扩散再到中部集聚,最终形成明显的中间地区塌陷的空间格局。由此可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快形成中部崛起的新局面,提高中部地区民生水平,让城乡居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关系到中国民生能否高质量发展。

### (二)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

#### 1. 全国及区域内差距

本文计算了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以便通过不同尺度剖析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见表3)。

从全国整体情况看,2010~2019年内基尼系数从0.212下降到0.160,年均下降3.10%,表明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当然,全国基尼系数并非每年均下降,2011、2013和2016年比前一年小幅提高,个别地区间的差距稍有扩大,全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185,最大值为0.233。总体上看,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

从三大区域内部看,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0.159)>西部(0.112)>中部(0.066)。对比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东部(0.419)>中部(0.264)>西部(0.248)发现,虽然东部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相对最高,但其内部各省之间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见图1),如河北、辽宁和海南三省比东部地区其他各省水平低。中西部地区民生在持续改善的同时,内部省份之间发生分化。西部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整体滞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并且内部12个省份的均衡性较弱,2010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中,仅内蒙古、四川、西藏、陕西与新疆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在0.2以上,明显低于东中部地区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平均基本型民生指数位于东西部之间,但其内部8个省份均衡性较强,基本型民生建设水平差距较小。

#### 2. 区域间差异

表4展示了三大区域间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变动趋势,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下降。2010~2019年,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的基尼系数分别由

表3 2010~2019年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

年份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0	0.212	0.169	0.086	0.140
2011	0.233	0.191	0.071	0.131
2012	0.200	0.174	0.043	0.112
2013	0.201	0.171	0.072	0.128
2014	0.187	0.144	0.071	0.120
2015	0.170	0.144	0.071	0.106
2016	0.178	0.142	0.085	0.115
2017	0.158	0.142	0.063	0.079
2018	0.154	0.154	0.050	0.085
2019	0.160	0.156	0.042	0.108
均值	0.185	0.159	0.066	0.112

0.32、0.24 和 0.14 下降到 0.21、0.21 和 0.09, 呈现(东部—西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态势。这说明东西部之间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差距最大, 其次是东中部之间, 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最小。从具体变动上, 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明显, 基尼系数由 2010 年的 0.32 下降到 2019 年的 0.21, 降幅为 34.38%。东部和中部地区间的差距除了 2010~2011 年出现上升外, 其余年份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间基尼系数从 2010 年的 0.14 下降到 2019 年的 0.09。三大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表明, 虽然整体上三大区域的基本型民生水平仍存在差距, 但这一差距随着经济水平、财政投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水平不断增加具有明显的缩小趋势。

3. 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差距来源及贡献分解

表 5 显示, 2010~2019 年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来源, 按照贡献率由大到小依次为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超变密度。从变化走势看, 区域间差距贡献率由 2010 年的 71.09% 下降到 2019 年的 63.26%。区域内差距贡献率在 23%~25% 之间

表 4 2010~2019 年三大区域间基尼系数

年份	东部—中部	东部—西部	中部—西部
2010	0.232	0.317	0.141
2011	0.280	0.349	0.125
2012	0.256	0.296	0.094
2013	0.254	0.284	0.111
2014	0.235	0.271	0.107
2015	0.217	0.241	0.099
2016	0.221	0.254	0.107
2017	0.210	0.229	0.077
2018	0.205	0.220	0.075
2019	0.214	0.212	0.089

波动。超变密度贡献率则逐年增大, 由 2010 年的 5.49% 上升到 2019 年的 10.90%。

中国基本型民生建设正在向高水平与均等化方向发展, 整体基尼系数的下降印证了这一点。从差距贡献率发展趋势看, 区域内差距贡献率  $G_w$  和超变密度贡献率  $G_t$  均不同程度上升, 区域间差距贡献率  $G_b$  虽然呈下降的走势, 但仍是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主要贡献者, 所占比重达 60% 以上。可见, 提升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均衡性, 要重点解决区域间特别是东西部的差距。超变密度贡献率的提升表明并非所有东部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都领先于其他地区, 因此在重点解决区域间差距的同时, 不应忽视东部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建设。

表 5 2010~2019 年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指数差异分解

年份	总体差距	区域内差距 贡献率(%)	区域间差距 贡献率(%)	超变密度 贡献率(%)
2010	0.212	23.42	71.09	5.49
2011	0.233	22.54	73.34	4.11
2012	0.200	22.76	72.16	5.07
2013	0.201	24.08	67.65	8.27
2014	0.187	22.78	70.31	6.92
2015	0.170	23.89	66.88	9.23
2016	0.178	23.76	68.15	8.09
2017	0.158	23.19	69.47	7.35
2018	0.154	25.00	66.76	8.24
2019	0.160	25.84	63.26	10.90



## 五、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

### (一) 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用上面测算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综合指数(LH)来表征。参考高和荣(2021)、高琳(2012)、陈世香等(2014)、俞佳立等(2020)的研究及数据的可得性,从经济、财政和人口3个维度选取5个指标。具体为:(1)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于反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的经济生活环境,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征。(2)财政分权度,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一部分财政管理与决策权的过程。地方政府是基本型民生落实及发展的重要施政单位,而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则是地方政府参与基本型民生建设的主要手段。民生保障和民生福祉的发展水平虽在“十四五”规划中被多次提及,但地方政府在推动民生发展的过程中,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及医疗卫生等多方面的发展要求,财政投入的项目重心在不同地区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体现在基本型民生建设上,财政分权度则反映地方政府对基本型民生发展的自主调整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参考孙蚌珠、刘翰飞(2010)的研究。(3)城镇化水平,用于反映地区的城镇化进程,通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得到。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明显特征,受自然资源禀赋和国家发展政策的影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通存在一定的障碍,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及人力资源的丰裕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地区间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基本型民生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4)人口密度,用于反映人口聚集程度的高低,通过地区总人口除以地区区划面积得到。人口密度的提高一方面能降低基本型民生的边际建设成本,推动地方政府对基本型民生建设的投入,对地方民生建设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高会导致基本型民生项目的人均占有率下降,对基本型民生水平产生不利影响。(5)就业水平。从微观角度看,就业较大程度上解决了个人的自主保障问题,对就业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民生保障有推动作用。从宏观角度看,就业水平的提高能刺激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进而对基本型民生建设产生影响。

### (二) 模型选择及结果分析

#### 1. 模型选择

为了分析上述5种不同因素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及相对大小,本文在估计模型的回归系数时,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除量纲对回归参数的影响。首先运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的设定进行参数估计,Hausman 检验统计量的值为50.65,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回归中应纳入固定效应,通过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可以排除某些不可观察的因素影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从回归结果看,地方财政分权度和人口密度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抑制

表 6 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系数	t 值
人均 GDP 对数	0.504***	2.950
财政分权度	-0.169***	-2.636
城镇化水平	0.645***	4.824
人口密度	-1.647***	-3.372
就业水平	0.194***	3.242
拟合系数	0.966	
LM(rho=0)	18.517***	
Robust LM(rho=0)	0.008	
LM(lambda=0)	22.154***	
Robust LM(lambda=0)	3.646*	

注: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作用;城镇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水平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模型的可决系数为 0.966,这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然而,根据空间计量理论,存在空间效应时,仍采用一般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会导致回归系数产生偏误,为了判断空间效应是否存在,本文进行 LM 检验和 Robust LM 检验。从检验结果看,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滞后模型的 LM 统计量分别为 18.515 和 22.154,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应考虑空间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 Robust LM 检验统计量为 3.646,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而空间面板滞后模型的 Robust LM 检验统计量值为 0.008,且不显著,因此,本文选择空间面板误差模型作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的起点。

为了探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是否会退化为空间面板误差模型或者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本文进行 wald 检验。经检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 wald 检验统计量为 14.223,空间面板滞后模型的 wald 检验统计量为 21.603,二者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应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作为最终的回归模型。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包含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对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参数的解释也与普通面板回归模型不同,本文采用 Elhoss 的做法,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展开具体分析,直接效应表示各因素对本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而间接效应表示各因素对周边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影响,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参数分解结果如表 7 所示。

2. 结果分析

表 7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变 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人均 GDP 对数	0.679***	3.528	0.853	1.568	1.532**	2.313
财政分权度	-0.183***	-2.759	-0.479*	-2.687	-0.662***	-3.238
城镇化水平	0.488***	3.460	0.234	0.621	0.723	1.689
人口密度	-1.857***	-3.620	4.401***	3.039	2.545	1.645
就业水平	0.167***	2.861	-0.072	-0.445	0.095	0.499
拟合系数	0.971					

注: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7 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就业水平、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度对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产生了直接或间接效应。

从直接效应看,对本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就业水平。产生抑制作用的因素为财政分权度和人口密度。从影响程度的大小来看,大小依次为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财政分权度和就业水平。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1.857,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产生了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679,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越高的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城镇化水平回归系数为0.488,说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也相对更高。财政分权度回归系数为-0.183,表明较高的地方财政的自主水平不利于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工具来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时,财政投入未能处理好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就业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167,这意味着就业水平有利于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提高。

从间接效应看,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度产生了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大,回归系数为4.4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区人口密度的提升主要受外来人口流入的影响,本地区新生人口带来的人口密度提升效果微弱。因此,在人口大量流动的背景下,本地区人口密度的提升往往意味着周边地区人口密度的下降,进而本地区的人口密度会对周边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本地区财政分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为-0.479,表明本地区财政分权度对周边地区的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在制定民生保障目标时,尚未建立起相应的长效绩效考核机制,地方政府施政重心的偏移并非个例。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在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有关空间模型选择的统计量检验的结果如表8所示。与前述分析过程相似,由统计量的显著性可知:在反距离空间权重的设定下,本文仍选择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作为最终的分析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参数的空间效应分解结果(见表8)。

表8 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下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人均 GDP 对数	0.707***	4.148	2.265***	3.270	2.972***	3.906
财政分权度	-0.162***	-2.540	-0.905***	-3.863	-1.067***	-4.393
城镇化水平	0.492***	3.451	0.164	0.369	0.656	1.503
人口密度	-1.814***	-3.630	5.268***	3.804	3.453***	2.515
就业水平	0.164***	2.598	-0.083	-0.512	0.081	0.436
拟合系数	0.971					

由表7和表8可知,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在系数的方向、相对大小及显著性方面基本一致;在空间溢出效应中,所有

注: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影响因素的方向均保持不变,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性有所提高,但其影响程度的大小仍位于人口密度之下,说明结果也较为稳健可靠。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0~2019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Dagum 基尼系数和空间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高水平 and 较高水平省份在东部集聚,低水平和较低水平由西部集聚到中部集聚。(2)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均等化程度增强,但区域差距依然明显。三大区域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基尼系数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区域间差距是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间差距贡献率明显下降,区域内差距贡献率较稳定,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明显上升。(3)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就业水平对本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人口密度和财政分权度对本地区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抑制作用;人口密度对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财政分权度则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重视基本型民生在 4 种民生类型中的基础性地位,注重基本型民生发展的区域均衡,增强基本型民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与相互促进性。通过加大基本型民生项目建设,提升最大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一方面,在加快西部地区民生事业建设的同时,持续增加中部地区基本型民生投入,优化并完善基本型民生资金、项目等供给,推进基本型民生项目落实,为迈向共同富裕提供现实条件。另一方面,要注重基本型民生事业向乡村地区适度倾斜,切实提高乡村地区教育、就业、社会保险、住房等事业的建设质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切实保障乡村享有更加公平与殷实的发展机会,推进基本型民生城乡均衡协调发展。(2)强化政府的基本型民生建设责任。要争取更多的资金向中西部地区投入,增加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一般或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及减税降费减收较多地区倾斜,尽快缩小三大区域之间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差距。要完善基本型民生评价体系,不仅要考察地方民生事业的总体投入水平,更要考察地方政府用于基本型民生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投入比例,推动地方更多地聚焦于基本型民生建设,形成更加合理的民生类型投入结构,切实夯实社会和谐及社会稳定之基。(3)引导人口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一方面,中央及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劳动力年龄人口流出人数占流出地总人口比重高的地区基本型民生项目及资金投入力度,减少因劳动力流出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乏力、基本型民生投入不足问题,着力解决



欠发达乃至不发达地区人、财“空心化”和逆向流动问题。另一方面,加大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力度,透过产业吸引人才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流动。同时,提高对落户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劳动人口的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险及住房补贴标准,进一步夯实这些地区对劳动人口的吸引力。

#### 参考文献:

1. 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10):《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苗正民、滕玉英译,商务印书馆。
2. 陈明华等(2019):《中国城市群民生发展水平测度及趋势演进——基于城市 DLI 的经验考察》,《中国软科学》,第 1 期。
3. 陈世香、谢秋山(2014):《居民个体生活水平变化与地方公共服务满意度》,《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4. 高和荣(2020):《论托底型民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5. 高和荣(2021):《论改善型民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
6. 高琳(2012):《分权与民生:财政自主权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第 7 期。
7. 姜扬(2018):《民生性财政支出、门槛效应与城乡收入差距》,《社会科学战线》,第 5 期。
8. 理查德·蒂特马斯(2011):《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李志强等(2012):《民生指标体系构建及赋权方法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 9 期。
10. 孙蚌珠、刘翰飞(2010):《中国财政分权的数量化度量及其地区间差距——基于 1979~2008 年省级面板数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 5 期。
11. 谭之博等(2015):《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倍差法”的估计》,《经济学(季刊)》,第 3 期。
12. 童星(2019):《新时代民生概念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 1 期。
13. 王青、王娜(2014):《民生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统计与决策》,第 17 期。
14. 叶胥等(2018):《中国居民民生获得感与民生满意度:测度及差异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 10 期。
15. 俞佳立等(2020):《中国居民健康生产效率的动态演进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 5 期。
16. 张弥(2014):《民生幸福指标体系的构建:一个初步框架》,《科学社会主义》,第 3 期。
17. Dagum C.(1997),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 *Empirical Economics*. 22(4):515-531.
18. Disney R.(2004), Are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Pension Programmes a Tax on Employment?. *Economic Policy*. 19(39):267-311.
19. Hemerijck A.(2018), Social Investment as a Policy Paradig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5(6):810-827.
20. Wilensky H.L., Lebeaux, C.N.(1958),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Supply and Organ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责任编辑:朱 犁)